

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解放出来”。^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首先就是要学习李大钊等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只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就一定会迅速提高。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张 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中国新史学的规划:尊奉进化史观,视史学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经世目的,研究内容要有“中国史与世界史”视野和“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的改变。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唯物史观史学,尊奉唯物史观,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强调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重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因此,“‘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做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②

然而,“新史学”思潮并未走得很远,而唯物史观史学却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从学术层面而言,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进化史观来源于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总结,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将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研究西欧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模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角度建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二者虽均属线性历史观(进步、发展,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下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后者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显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上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当新的社会变局到来之时,“新史学”逐渐与巨变中的时代大潮相脱离,落后于中国社会变化的步履,而唯物史观则充当了解读“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课题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史学则成为解释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生力军。第二,“新史学”运用进化史观阐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很难做出更具体、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成果,学术建树相对较弱。较为突出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能做到的只是对中国历史作上古、中古、近古的基本划分,再进一步分析则显得力不从心。唯物史观史学则出现了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出现了一系列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著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重要成果,成为开启唯物史观史学发展的导向性著作,也为中国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没有政治背景、中西学养兼备并擅长学术批评的张荫麟,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他具体指出这条“大道”的独到之处在于:

① 《恽代英文集》,第903页。

② 李红岩:《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形成》,《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第一,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才是历史中的主要部分之一,比那些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更具意义;第二,古代记录的可靠性难以考订,而这些传说的社会背景则不能凭空捏造,可以反映出传说时的真实的社会情形;第三,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具备有“理性”和“历史的逻辑”。因此,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社会背景、社会制度这些因素去考察历史发展过程,无疑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研究路径”。^① 仔细推敲张荫麟所揭示的这三点意见,其实是准确地概括了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路向。

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能够发展成为中国史坛独树一帜的史学流派,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其中,至少有两件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件事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另一件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前途何在、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等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就此开始。有着不同政治背景的各种观点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激烈交锋、各抒己见。论战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有什么主要特征?第三,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些问题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分以学术为主,具有现实意义的成分以政治为主。辨明这些问题,才能认清中国社会性质,才能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目的和任务。由于这是唯物史观首次较大规模地被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许多混乱和不足相伴其间,如翦伯赞认为论战存在的问题是“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起的历史研讨,反而脱离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② 参加论战的人员非常复杂、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受制于不同的政治观点。有学者据此认为:“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③ 也有学者强调,论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件,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它释放出的辐射力和形成的冲击波,影响了整个现代中国史学的格局和走向”。^④ 笔者以为,社会史论战之于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学术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在论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成为绝大多数论战观点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积极作用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唯物史观在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取得了重要地位,就这些方面而言,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史学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唯物史观史学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发展方向的契机。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⑤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问题在延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若不把马列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去,若不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使马列主义更加深入中国,就不能更加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⑥ “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何在呢?那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今后的历史研究者,要越过那种以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随便配合上一点历史材

①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2年1月4日。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③ 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④ 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⑥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

料便算解决了中国历史问题的低级阶段,他们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到一般性与特殊性”。^①重庆地区的《读书月报》在第1卷第3期设“学术中国化”栏目。《理论与现实》杂志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办刊宗旨,开展了“学术中国化”讨论,吕振羽、侯外庐、嵇文甫、胡绳纷纷撰文参与。胡绳说:自1940年提出“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之后,史学界起而响应,中国史的研究尤取得了可观的业绩。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泽等人的古代史研究,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华岗、严中平、李平心等人的近百年史研究,都是其中的代表。“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而且可说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学术研究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基础,那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才能使洋八股和洋教条完全‘休息’下来”。^②与社会史论战相比,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者在政治派别与政治立场上已经趋于一致,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体。更重要的是,“学术中国化”讨论的适时展开,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意识地去克服社会史论战“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的弊端。有学者指出:“在‘学术中国化’的语境之下,左派学界不仅很少再译介苏、日左派的中国研究,而且原先那些译著亦由争先恐后的引征、赞誉,转而逐渐失去借鉴、参照的正面价值,显得过时、落伍,乃至被视为负面作用的著作,成为中国左派史家建构‘物观中国史’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至少在宣称上加以批判,消除影响,以凸显中国左派史家的主体地位。”^③唯物史观史学正在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现实和学术的要求,使通史撰述已经成为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只有拿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研究著作,唯物史观史学体系才意味着建立健全,在政治斗争领域,才能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与解释。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家十分重视通史撰述,相继完成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许立群《中国史话》(1942年)、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1941年)、翦伯赞《中国史纲》(1944年)、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1940年)、吴泽《中国历史简编》(1945年)等。其中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影响最为广泛。毛泽东看到该书后评价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④齐思和说:“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⑤这两个评价非常明确地表明,以《中国通史简编》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有了发言权,唯物史观史学对历史的解释体系已经成型并凸显出其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影响力。唯物史观史学发展,在以史料考证为主流的民国史学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1944年,陈寅恪写信给即将以国民参政会代表身份访问延安的傅斯年:“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⑥顾颉刚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

①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② 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第2卷第5期,1946年。

③ 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④ 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⑤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

⑥ 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37页。该书编者注称此信写成时间为“约一九二九年”,误,当为1944年,见朱新华:《谈陈寅恪致傅斯年第十六函》,《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

与之争锋呢?”^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②这六个“转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史学区别以往史学的主要特征,也宣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展:对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各断代史、专史以及各个专题的研究也渐次展开,考古学研究成就突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获得重大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认真梳理和探讨那些以往积累下来的、因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出现的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客观条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历史理论问题得到大范围地、热烈地、深入地讨论,其中前五个问题因受到更多的关注而被称为“五朵金花”。尽管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理论运用与方法上存在着教条化与“左”的倾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史学界也受到了许多消极影响。“文革”的爆发而使史学陷入了更为混乱的局面中。新时期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开始步入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历史学积极拓宽研究领域,更新研究理念和深化课题意识,表现出了新的气象。到了20世纪末期,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继续发展,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一个基本的认识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只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已经过时的观点,一定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③

总体上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在新的形势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挑战。如片面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把唯物史观看成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推翻与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推崇和接受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其他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无限拔高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的其他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不再更多地去重视那些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回避以往对那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讨论的观念和模式,热衷于对历史事件提出“多元”的、新的解释。被刻意渲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氛围,将史学剥离于现实政治,片面突出学术“独立”和史学“求真”,将“学术”、“学问”置于象牙塔中膜

① 顾颉刚:《致白寿彝·四(1947年9月23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4页。

②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

③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拜。因主张文化复兴或弘扬传统文化致使掀起了“国学热”，新儒学、国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评价获得提升，试图以此摆脱被认为是基于西方理论构建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以复兴国学来追求认识中国历史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认识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中的位置、怎样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怎样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探索其继续发展的道路，都成为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关键问题。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国史学在20世纪之所以选择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发展壮大起来，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学发展的结果，必然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存在过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不断改进与及时总结。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在遇到挑战的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机遇的来临。

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其他学派和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坚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各种新的历史理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应当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在兼容并蓄中体现自身的优势；同时，还要善于分析鉴别他人之长，而不是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学派，在它产生时期，曾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有容乃大’，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类文化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在发展中才能很好地坚持。”^①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在这种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体现出主流史学的作用，引领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繁荣。全球化趋势和西方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史学不可能置身事外。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方法研究历史，使中国史学不断有所收获、有所创新，中国史坛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陆续形成了一些有特点的史学思潮与流派，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多元化的中国史学正在呈现出新的生机。

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紧迫性与可能性

吴 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指导地位在近年来有所削弱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到马克思，准确解读原著，对唯物史观重新做出解释，并运用新的解释体系对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解析，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

当我们回顾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地位的变化时，大体可以观察到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逐步提高、影响力逐渐扩大的阶段，它从李

^①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